

市场星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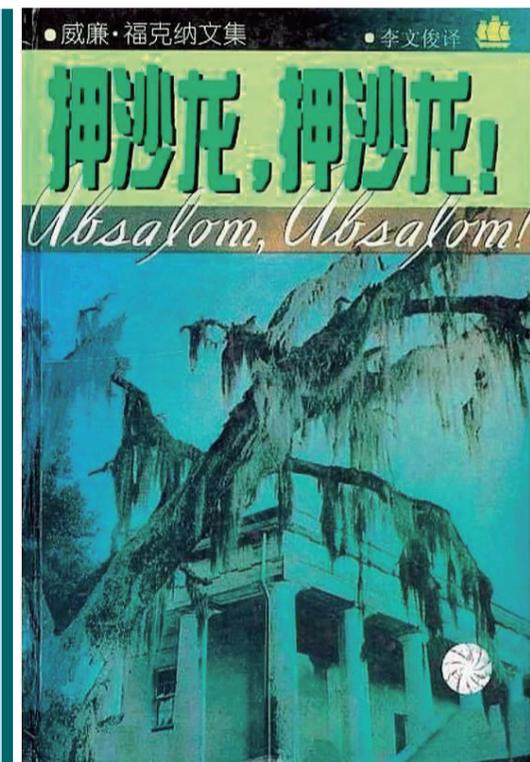
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1.8.14
星期六 辛丑年七月初七
今日4版 第7706期

全国数字出版
转型示范单位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阅 WEEKLY 周刊 读



高峰时期,《世界文学》发行量曾达到三四十万册。文学青年互相传看,一册杂志能传递几十手。围绕着这份刊物,几代“盗火者”接力翻译,让中国读者得以看见不一样的世界。

中国“盗火者” 讲述他们的翻译生涯

文学,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。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“盗火者”,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“天火”。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。

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,柳鸣九深居简出,周克希翻译了三卷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后觉得精力不济,放弃了。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,“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,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。”李文俊说。

打着批判的幌子

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,向后一仰,长叹一声:“总算是完成了。”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,历时3年,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《押沙龙,押沙龙!》。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。“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。”他筋疲力尽地立誓,“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。”从1980年起译《喧哗与骚动》,到1998年译完《押沙龙,押沙龙!》,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,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,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。《押沙龙,押沙龙!》是福克纳最深奥、文体最复杂的一部,很多句子长达几页,结构错综复杂。时常,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,第二天坐到桌前,又大改一遍。

后来,最出名且畅销的《喧哗与骚动》又有多种译本问世,但《押沙龙,押沙龙!》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。这本书译完后,他心脏病发作,走了一趟鬼门关。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,说起这个,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:“也不能怪他,是我自己的毛病。”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。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,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。莫言受其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”启发,创造了文学故乡“高密东北乡”,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。那时,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,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,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。

告别福克纳后,李文俊轻松了很多,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,眼光依旧独到。2009年,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·门罗小说集《逃离》出版,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,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这本书突然翻红,一再加印。门罗的短篇最早在80年代初就被《世界文学》译介过。那时,每一期《世界文学》目录都群星璀璨,18、19世纪的古典大师,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,正当红的外国新秀,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。其中,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。1979年,《世界文学》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,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《变形记》。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,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。

“我眼光比较厉害吧。”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时,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。他1953年进入《译文》杂志编辑部,杂志1959年改名《世界文学》,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。外文所有一点特权,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,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,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,于是自己动手,从英文转译了《变形记》,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。

《世界文学》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,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。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,他在杂志社工作整整40年,从一个“处理杂务”的小编辑做到主编。

被划分的领地

勤奋的翻译家们以惊人的速度补上了落下的课。改革开放之初,不仅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缺席,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外国文学翻译也不成体系。等到1993年余中先从中法读完博士,回到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时,世界名作差不多都已经被划分好了领地。“柳鸣九那一代首先要补上缺失的东西,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一下子就补上了。”余中先说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,“柳鸣九之后的一代,包括我,更多要翻译20世纪作家作品。我和同事们还要继续跟踪21世纪以来的佳作,同时发掘被遗忘或忽略的作家,以及前人畏难而没有下手的作品。”

余中先也想填补空白,翻译道路的开端,是当时国内尚未译介的法国作家,如奈瓦尔、克洛岱尔、吉罗杜。后来专门译介“新小说”作家,如贝克特、西蒙·罗伯·格里耶,也翻译过米兰·昆德拉。近几年,他又译了一些龚古尔文学奖等获奖作品,转眼已过花甲之年。他也可以把《悲惨世界》《局外人》拿过来译一个自己的版本,但没有必要。翻译家们形成一种默契:已经有优秀译本的书不用再去译,多去翻译一些从未译介的作品。经过前辈的苦心耕耘,剩下的遗珠要么小众,要么特别难,总之读者有限。这是当代译者给自己出的难题,放弃与经典名著绑定的机会,转而去开拓汉译文学新的疆域。

“一本经典有三四种译本足够了,版本太多质量没法保证,读者也不知道怎么选。现在只要哪个名家的作品进入公版期,出版社‘噙’的一下都找人翻,突然出来十几个译本。”余中先向来不热衷于重译经典。

文学翻译进入新的时期,经受商业的助推也被反向拉扯。高峰时期,《世界文学》发行量曾达到三四十万册,文学青年互相传看,一册杂志能传递几十手。《世界文学》现任主编高兴1979年上大学,他经历了那个文学的时代,“空气里飘浮着催人上进的气息”。

来源: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倪伟/文

几代“盗火者”的翻译接力

91岁的李文俊和爱人张佩芬住在北京潘家园附近临街的一栋楼里,他不出远门,不上网,没有手机。他几乎每天都去楼下市场转转,买点面包和水果,但再也不去书店和图书馆。他说自己已经脱离时代,也没什么人给他寄新书了。“我赶不上时代了,你来找我,是上当了。”黑框眼镜后面,他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。

在这间屋子之外,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。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。莫言说,看了李文俊给威廉·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,大受鼓舞,激动地转圈,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。谈话中,李文俊不时起身,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。从各个版本的《喧哗与骚动》到儿童文学《秘密花园》,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,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。“有那么大影响吗?不可能。”

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《译文》杂志(《世界文学》前身)编辑部,到80多岁停笔,他做了一辈子翻译,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。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塞林格、麦卡勒斯、爱丽丝·门罗。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。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,七八十年代,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